

《音韵阐微》与《谐声韵学》文献关系考辨

黄雪晴

《音韵阐微》(下文简称《阐微》)是清代一部官修韵书,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雍正四年(1726)修撰完成。由康熙皇帝下旨,着精通音韵之学的大学士李光地承修,其弟子翰林院侍讲王兰生实际编撰成书。今见《阐微》的版本主要有:雍正六年(1728)武英殿刻本、清扬州诗局刻本、四库全书本、四库荟要本、四库全书珍本、淮南书局本、清末四川刻本。武英殿刻本为最早的官方刻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天津、武汉、湖南等省市图书馆亦有藏本。四库所收及后来各家刻本,均以殿本为祖本。

《阐微》编撰之始,凡编撰宗旨、韵谱与韵书构架、编写体例与内容,李、王二人反复磋商斟酌,最后奏请康熙皇帝定夺。康熙精通满文拼音之法,又有意传承汉语传统韵书的正统;李光地为福建安溪人,精熟音韵,代表方言为闽南语;王兰生是直隶交河人,代表方言为河北方言。这样三个人的语言知识背景、韵书编撰的价值取向、实际运作中的具体作用,都是各有差异的,三者反复交合碰撞,最后形成《阐微》成书的性质和特点。从三人讨论《阐微》编撰的折子、书信来看,李光地最初打算参照满文和曲韵,编一部“合时谐俗”反映时音的当代审音韵书。王兰生主张“《唐韵》、今韵宜分二部”,即仍采用传统中古音系的韵书框架,又兼顾时音系统,也就是暗含古今两个音系。康熙皇帝倾向于后者,原因有三:一是满清皇帝必须让天下人承认清朝传承的是汉文化正统,清朝官修韵书必须保持传统韵书的音系框架,故需守《唐韵》(《切韵》音系)而“不遽变古”;二是认为“本朝十二字头为得天地之元声”,满语的音素字母直接拼读法比汉语传统反切更为便利和准确,因此要依其法彻底改良反切;三是清代官修韵书要为当代人所通用,就需要兼顾“今韵”的时音系统。最后是李光地放弃“合时谐俗”而服从康熙裁定的“不遽变古”宗旨。于是,《阐微》声母按三十六字母列字,韵目在平水韵106韵基础上调整,仿《佩文韵府》归为112韵,声调仍依中古分“平、上、去、入”四声。收字先列《广韵》、《集韵》反切,再用反切改良所得的优化反切标明“今用”而反映时音系统。

在这三人探索、磋商《阐微》编撰宗旨与样稿试编的过程中,有一部韵书

穿插其间，就是南书房奉康熙皇帝之旨发给李光地、王兰生看阅审读的《谐声韵学》（下文简称《韵学》）。既然是康熙皇帝在探求拟修新韵书宗旨、体例之时，特意发给两位主修者审读，《韵学》与《阐微》的关系必定非同一般，值得深入考辨。

一、《谐声韵学》成书与著者考索

李光地《覆驳谐声韵学札子》（《榕村集》，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九）云：

臣李光地谨奏，南书房奉旨发下《谐声韵学》五册，交臣看阅，钦此。

王兰生《交河集》（道光十六年大足官解刻本，卷一）载：

康熙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奉旨发下《谐声韵学》目录谱子一本，一卷至四卷四本。折子二个。

康熙五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张常住等奉旨交来《谐声韵学》十四本，五卷至十八卷。

李光地看的《韵学》是五册，王兰生看的《韵学》是目录一本、正文十八卷十八本。《续修四库全书》第257册影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谐声韵学》十六卷”（缺卷三、十、十五，实存十三卷）署“（清）释阿摩利谛撰”。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韵学》为稿本十八卷十八册，与王兰生同，可见此书确为十八卷稿本。

由于该书无序跋，成书年代及作者尚无定论。然在其卷四“及摄·合口副韵·晓母·调声”下收“薛，玄于切”；“理声”下“许，玄雨切”；“韵声”下“嘘，玄浴切”；“音声”下“虚，玄淤切”，四处“玄”字都缺右下角一点，显然是避康熙皇帝“玄烨”名讳，该书又为稿本，可以肯定成书时间在康熙初年（1662）之后。前引李、王二人奉旨校看《韵学》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而成书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卷首题有“汉人虞嗣订集《谐声韵学》”，综合考虑，《韵学》成书时间应在1662至1702年之间。《韵学》是由南书房奉旨发给李、王二人校看的，据陈晨考察，南书房为康熙十六年（1677）始设^①，那么《韵学》成书之后进入南书房的时间应不早于1677年。

关于作者，林庆勋推论可能是王兰生在修《阐微》之前修了一部《韵学》：“惟王兰生早期受李氏影响极深，加上他是道地北方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入蒙养斋奉命修韵书，如果修一部随时谐俗的《谐声韵学》应有可能。”^②赵荫棠据家藏《三教经书文字根本》所题：“阿摩利谛订集十二摄；汉人虞嗣订集《韵学》”，认为“《谐声韵学》该书即依《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而作”，作者为“虞嗣”^③。《续修四库全书》则据此题作者为“（清）释阿摩利谛”。

①陈晨：《汉语音韵札记四则》，《汉字文化》1990年第4期。

②林庆勋：《谐声韵学的几个问题》，《声韵学论丛》（台北）第二辑，1994年，第176页。

③赵荫棠：《谐声韵学跋》，《中法大学月刊》1:3, 1931年，第49—50页。

说《韵学》作者为“阿摩利谛”，显为误题。说是王兰生，只是一种推测。还有一说作者为“虞嗣”，当为“虞嗣集”之误。刘云凯据清初韵书《谐声品字笺》卷首署“钱塘虞咸熙兴宗氏草创，男德升闻子氏缵著，孙嗣集尔成补注”，及《凡例》末尾署“钱塘后学虞嗣集谨述”，认为《三教经书文字根本》的“虞嗣订集”很可能是“虞嗣集订”之误，《韵学》的作者应当为虞嗣集^①。这就需要考察虞嗣集与《谐声品字笺》的关系。

翻阅《谐声品字笺》四篇序文、《凡例》以及《八则》、《谐品应诘》诸篇，基本能了解《谐声品字笺》的作书缘由、时间及刊刻过程。《谐声品字笺》由钱塘虞咸熙（字兴宗）草创，其子虞德升（字闻子）“纂其先公遗业编次成书”，其孙虞嗣集（字尔成）为该书补凡例十四则。虞嗣集在《谐声品字笺·凡例》中论及：

先子毕生稽古，尊所闻而阐绎焉，皆会归六书之内，综合成书。藏之笥箧，不下十年所。岁在癸丑（1673），两中表昆陆鲁詹、昭明请授劂氏，竭蹶襄事，甫问事。丁巳冬（1677），先子遂谢世，余复以饥躯糊口四方……又数年矣。

可见，《谐声品字笺》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首次付梓刊刻，康熙十六年（1677）刻成，虞德升也于这一年去世。而在刊刻之前，该书“藏之笥箧，不下十年所”。因此，《谐声品字笺》的成书时间应不晚于康熙二年（1663）。《凡例》谓数年之后，“今甲子（1684）秋，新安程伊在深信是书为有功于世，纠合同志汇金貽侧理，广为流传”。此书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新安程伊在再次刊刻，虞嗣集的凡例也补于第二次刊刻之时。季仲棟在《读谐声品字笺·八则》中肯定虞嗣集在音韵学上的少年有成：

先生令嗣尔成，博雅君子也，能独任校讎之责，……盖幸子之才也，尔成何多让焉。

有这样的家学传承与早年独校韵书的实践，虞嗣集自然具备一定的韵学功底与修养，后来编出《韵学》也是有其知识基础与学术渊源的。

另外，从虞嗣集与查升的交往中，也能得到一些相关信息。阮元辑《两浙𬨎轩录》（嘉庆刻本）卷十七“查遴”节记载：“查遴，字叔达，又字宸铨，海宁人。官浦江教谕，擢罗田知县，著《未然吟草》。”又“查升《未然吟草·序略》曰：余叔宸铨，生时负异稟，……”；“虞嗣集《未然吟草·序略》曰：查子叔达弱冠时，……”。虞嗣集、查升均为查遴《未然吟草》作序，当为同时人。清陶元藻辑《全浙诗话》（嘉庆元年怡云阁刻本）卷四十四“国朝查升”条：“升字仲韦，一字声山，海宁人，康熙戊辰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至詹事。”清钱保塘编《历代名人生卒录》（民国海宁钱氏清风室刊本）卷八：“查升，字仲韦，康熙四十六年卒，年五十八。”由此可推算出查升生活在1649至1707年之间，虞嗣集

^①刘云凯：《谐声韵学作者蠡测》，《汉字文化》1990年第2期。

也当在此时,这与《韵学》成书于 1662 至 1702 年之间相吻合,虞嗣集有可能是该书作者。

上引《全浙诗话》记载查升任过翰林院编修,又官至詹事。詹事府是清朝的中央机构,主要管理皇帝、皇子的内务。康熙皇帝设置南书房,在清鄂尔泰所撰《词林典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皇朝南书房入直题名”中列有“海宁查升”。又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嘉庆十七年刻本)卷一“胡渭”条下载:“康熙己卯(1699),因再从侄会恩官京师,乃复游日下。礼部尚书李振裕、侍讲学士查升皆以为当代儒宗。”又清李元度辑《国朝先正事略》(同治刻本)卷四十“查初白先生(查嗣瑮、查升)事略”载:“声山学士名升,字仲韦,康熙戊辰进士,官少詹事,书法得董文敏之神,入南书房,圣祖屡称赏之。”康熙初,入直南书房的翰林一般都才品兼优,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也称“南书房行走”。查升与虞嗣集同为查遵《未然吟草》作序,两人可能相识并交往。如果虞嗣集是《韵学》的作者,那么《韵学》进入南书房,就可能是查升荐举的。南书房 1677 年始设,查升 1688 年中进士后才有资格进入翰林院,那么《韵学》可能在 1688 年之后才进入南书房,然后被康熙选中,于 1713 年下旨发给李光地、王兰生看阅,为编撰新的官修韵书《阐微》作准备。

二、李光地、王兰生看阅《韵学》之所得

李光地《覆驳谐声韵学札子》云:

臣李光地谨奏:南书房奉旨发下《韵学》五册,交臣看阅,钦此。臣看得等韵原有三十六字母,今此书删去其十五,只存二十一母。盖等韵备清浊之声,而此书不分清浊故也。声有清浊,自古已然。故宋艺祖《中原雅韵》、明太祖《洪武正韵》,虽韵部有归并,而清浊不改;邵子《皇极经世》又增多至四十八母,虽并有音无字者而兼收之,略与等韵同异,然于清浊之辨亦未尝稍浑也。此书清浊不分,可否通行,伏候圣裁。又每字母中所收平声多是入声,入声多是平声。盖此二声北人多不能辨,故有此误。若编为成书,似须用古今韵书参对,庶几乎上去入不至讹错。又字样多系生造,似亦当用六书所有之字,乃可行远。至有音无字则仿邵子之法,直空其位可也。统候圣裁。

从“若编为成书”这几个字来看,《韵学》在当时似乎还没有完全定稿成书,这一点也可以解释现存《韵学》为何只有稿本而未刊刻。康熙皇帝积极修订多种字书、韵书,《韵学》很可能是其中之一,甚至有可能是作为“准韵书”来对待的。从李光地对《韵学》的否定态度来看,康熙对《韵学》大肆变古不满意,故确定重修一部新的韵书,把《韵学》稿本发给李、王看阅批校,为修新韵书作准备。

李光地批评《韵学》不妥有三:一是传统三十六字母,《韵学》只存二十一字母,主要是不分清浊音声母;二是入声与平声相混,北人不能辨;三是所收生

造字多。

李光地最初是主张编一部反映当时官话时音的韵书，那么《韵学》的全浊声母清化、入派三声（以入平相混代表）正是最突出的时音特点，应该采用的。但康熙皇帝主张“不遽变古”，而这两点恰恰是中古音系到近代音系最突出的音变，李光地揣度圣意，严厉地批评《韵学》“变古”最突出的这两点，以便贯彻康熙保存传统韵书旧制的编撰思想。后来编成《阐微》，就是保留三十六字母和入声调的，只是在合声反切的“今用”系统中暗含了《韵学》明列出的这些历史音变。用字上，《阐微》只收了17366个字头，比《广韵》还少5000多字，《韵学》所收的生僻字都去掉了，只保留当时通用语中的常用字，因为韵书收全所有音节的常用字就够了，至于同音字组中的难僻字，已经有《康熙字典》可以查用，不烦备列。说明这一条批评是合乎康熙旨意且切合实际的。

王兰生除了康熙五十三年（1714）正月、二月收到南书房奉旨发给他《韵学》十八卷稿本外，《交河集》载：

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二十日：诚亲王、十六阿哥奉旨，尔等率领何国宗、梅毅成、魏廷珍、王兰生、方苞等编纂朕御制历法、律吕、算法诸书，并制乐器，着在畅春园奏事，东门内蒙养斋开局，钦此。自入蒙养斋分较《律吕正义》、《数理精蕴》、《卜筮精蕴汇义》，纂辑韵书。（卷一“恩荣备载”）

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是年公三十六岁）五月二十七日：再到热河行在。因母病又乞假回家。奉旨，许他回去，叫他将韵书带回家去收拾。有不明白处，问大学士李光地。钦此。（卷一“恩荣备载”）

康熙五十四年（1715）八月二十日：臣自回家后，谨依李光地所说，将平声、上声按字查对编次。虽略有草稿，以臣愚陋，实难自信。及八月内，臣家事属安，随于十八日到京，再问大学士李光地。谨拟凡例数条，式样数页。然李光地亦未敢定其可用与否，惟求皇上裁示。又臣以下里庸材，幸得恭聆圣训，于翻切之法不过微有一隙之明，至于笔画之本于六书，字义之出于经史者，臣素日全未讲究。伏望简用学问渊博之臣，查对笔画字义，臣但与备检校音切之一役。庶几稍成篇帙，取次呈稿，以俟圣明裁定。臣不胜惶恐之至，谨奏。（卷三“奏折”）

在康熙皇帝1713年所下圣旨中，王兰生就被列入亲王率领“纂辑韵书”的重臣名单，时年34岁。再过一年（1714）两次收到奉旨发下的《韵学》稿本，应该是给他作为编撰新韵书的参考样本。次年（1715）五月奉旨带回家“收拾”的“韵书”，不会是十年后才编定的《阐微》，应该是对发下样本《韵学》的批校、取舍与选择，以利参照设计新编韵书的凡例与式样。在家三个月，就平声、上声“按字查对编次”，应该是以《韵学》为基本依据，再逐字查对《广韵》等，编出草稿。八月十八日返京，就“凡例数条、式样数页”商问于李光地，然后奏请康熙皇帝审定。

由此可见,《韵学》一直是李光地、王兰生编撰新韵书的参考样本。

三、两书在构架、音系、反切上的异同

1. 韵书构架方面

《阐微》收 17366 个汉字及其音读,书首先有“韵谱”,仿《切韵指南》列三十八图。韵书正文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卷,总十八卷;声母以三十六字母“始见终日”标目;韵母遵“平水韵”仿《佩文韵府》归 112 韵,再分“开、齐、合、撮”四呼列字。

《韵学》以“及、干、庚、罡、根、该、杰、高、钩、械、革、尜”十二摄统领全书,每摄分“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四类,实为“开、齐、合、撮”四呼,十八卷就是按十二摄加开合来分的。每韵摄按“见群疑、端透娘、邦滂明奉微、精从邪照床审、影晓、来日”二十一声母“始见终日”排列。每声母再分“调、理、韵、音”即“阳平、上声、去声、阴平”四声调。

《阐微》“不遽变古”的宗旨,首先就要体现在韵书框架形式上,所以其韵书正文仍按《广韵》、平水韵系韵书的传统框架,以“平、上、去、入”声调为纲分卷,112 韵按“东”至“乏”传统韵目顺序排列,每韵下按传统三十六字母加四等列声母,再按小韵目标反切,再列同音字组各字并作释义。即便这样,韵字分“开齐合撮”四呼排列,声母“始见终日”排列,还是吸收了《韵学》的体例优点,因为这是康熙时代语音系统的实际存在。

2. 语音系统方面

《阐微》看似保存传统《切韵》及平水韵的音系,小韵目下首列《广韵》、《集韵》反切,显示平上去入四声调、三十六字母、112 韵列目、两呼四等诸特点;但又在局部编排、降格按语及小注之中,尤其是合声反切的“今用”系统中,反映时音音系的很多内容与特点,这些内容与《韵学》有密切关系。因此,林庆勋经对比认为,《阐微》暗含的今音系统与《韵学》的音韵特点有太多的吻合:如全浊声母清化、韵类合并而趋于简单、平分阴阳及浊上归去的声调变化等。他甚至认为《韵学》与《阐微》的编者是同一批人,甚至可能就是王兰生,《阐微》的前身也可能就是《韵学》。^①

仅以这些来断定《阐微》和《韵学》的作者为同一人,似乎求之太过。我们认为,音系上的这些相同的特点,是近代汉语官话音系的总体特征,不是这两本韵书独有的必然的内在联系,不好单从这些相同点去推测两书是同一作者编写的同一韵书的前后文本。

3. 反切用字方面

韵书的相同程度高低,最容易从反切用字的同异度上看出来。我们抽样调查《韵学》卷四“及章摄合口副韵”所收 248 个韵目字的反切,将其在《广

^①林庆勋:《谐声韵学的几个问题》,第 169—193 页。

韵》、《集韵》、《五音集韵》以及《阐微》中所对应的音切一一查找出来,进行对比分析,以管窥《韵学》与《阐微》反切传承的面貌。

林庆勋在《音韵阐微研究》中认为,《韵学》反切主要承袭《五音集韵》。我们所做的抽样数据库也有力证明了这一点。在抽样的 248 条音切中,《韵学》与《五音集韵》全同的有 176 条,占 71%。另外,《韵学》与《广韵》完全相同的音切为 117 条,与《集韵》完全相同的 29 条,与《阐微》完全相同的只有 5 条。由此可见,《韵学》对《广韵》系韵书(包括《五音集韵》)有很大的继承性,而与《阐微》在反切用字上的传承性几近于无。就此而言,《韵学》与《阐微》不可能是同一作者编撰的同一韵书的前后文本。

但是,248 条音切中,《韵学》不同于《广韵》的 108 条,不同于《集韵》146 条,改动了近一半以上的传统反切,而且在拼切音理上是趋于便利的,这实际上是以《阐微》彻底的反切改良探索了道路。李、王二人在校看了《韵学》之后,即着手编撰《阐微》,最大的创新就是:吸收满文等拼音文字的音素直接拼合法,把传统反切彻底改造为最利于直接拼切的“合声反切”。在这一点上,《韵学》改传统的反切,为《阐微》开拓了思路,但改得不彻底不优化,所以《阐微》基本上不用《韵学》的反切,而是勇于探索新路,全面彻底地改良出自己最优化的合声反切。《韵学》还用部分不易切除的阳声韵尾的反切上字,《阐微》都改为最易切除的阴声韵尾反切上字。《韵学》还用带声母的反切下字,《阐微》改为能直接拼读的零声母下字。如“胥”字,《韵学》“及章撮合口副韵邪母理声”作“胥,徐居切”,《阐微》卷二“六鱼”作“胥,《广韵》相居切,《集韵》新于切,今用粟于切”,《广韵》、《集韵》上字“相、新”都带鼻辅音阳声韵尾,《韵学》、《阐微》改为元音尾阴声韵字“徐、粟”;《广韵》、《韵学》下字“居”带舌根声母的见母,《阐微》承《集韵》改用喻母的“于”为零声母。又如《阐微》卷七“六语”:“叙,《广韵》徐吕切,《集韵》象吕切,今用徐语切”,只保留《广韵》阴声韵上字“徐”而舍弃《集韵》阳声韵上字“象”,把《广韵》、《集韵》带来母的下字“吕”改为零声母的“语”,而《韵学》“叙,徐吕切”仍承用《广韵》带来母的下字“吕”。因此《韵学》承用《广韵》、《集韵》的反切在总数的一半以上,《阐微》却很少,承用的少数,只是因为合乎其“合声切法”原则,如《阐微》卷七“六语”:“与,《广韵》余吕切,《集韵》演女切,今从《广韵》”;卷十五“四质”:“橘,《广韵》居聿切,《集韵》诀律切,今从《广韵》”等,都是选从上字为阴声韵、下字为零声母的反切。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汉语言学系